

责任编辑：钱舜娟

封面设计：章西厓

封面题字：姜东舒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

(上)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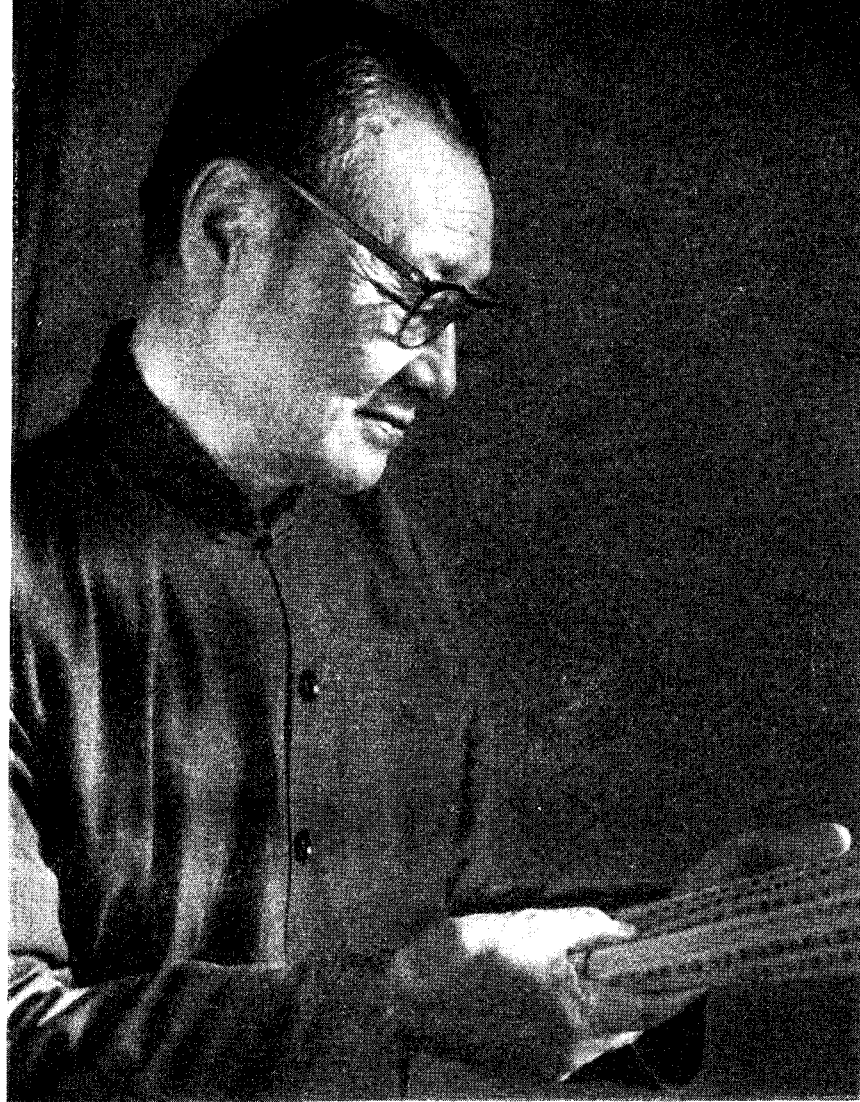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精装 10 平装 6 字数 325,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装 1—1,200册 平装 1—6,800册

书号：10078·3353 定价：精装 2.45元 平装 1.50元



作者像

堂殿莊嚴靈炬紅朱顏白
髮盡英雄自熱苦勞書齋
雙也以微勞所賦詩

出席北京市劳模大會

七古

鍾敬文



壬戌暮春書



作者与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同志和研究生、留学生合影



作者与花会演员交谈

自序

一九七六年秋末，在我国国土上横行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粉碎了。雨过天青，祖国的生命恢复了健康。随着整个文艺、学术的启蛰，民间文学事业也在伸出头来。被砸烂了多年的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活动了。我个人重新登上讲堂，并且拿起被迫搁置了许久的写作之笔。朋友们怂恿我辑刊以前所写的旧作，以供新的青年一代学者们观摩、参考。我接受了他们热情的建议和帮助，于前年秋先编成《民间文艺谈藪》一书（去年夏间出版），现在又辑成这个篇幅较大的文集。这集子所收录的文章，时间自二十年代中期直到最近，凡我手头所能找到的、多少有些保存价值的，大都收集在这里。它是我生平这方面文章较大的一次结集。

回想起来，我执笔写作这类文章，时间是比较早的。确切的年月虽然记不清楚，但大体上说，是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和语丝社的《语丝》周刊发行的前后。当时学界收集和发表歌谣（稍后还有故事）的风气很盛，我在热心采录这类“野生”文艺之余，就产生了谈论它的兴趣。《歌谣》上所连载的《歌谣杂

谈》(共十五则),就是那个时期写作的。在体裁上,它只是一些札记、随感录之类。一九二七年秋至次年夏,我在中山大学除教书外,兼编辑刊物(《民间文艺》、《民俗》)和民俗丛书。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兴趣的加强,写作的东西就更多起来。篇幅上虽然偶有较长的,但一般仍然是随笔、短论之类的小品。这主要是由于我当时专业学识和一般人文科学知识都很浅薄,执笔时间也往往比较匆促。

一九二八年秋,我从广东转到杭州工作。在那里,我跟一些热心这方面学艺的朋友编印专门刊物,并创立了中国民俗学会。此外,我还在当地一个培养民众教育工作干部和师资的学校讲授《民间文学纲要》(记得曾有铅印讲义)。在这时期,我才比较认真思考问题,初步写作了一些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例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地方传说》和《中国水灾传说及其它》等。

稍后,我到日本东京学习。在那些年月里,阅读的范围更广泛了,写作、思考的时间也比较集中,我曾先后写作了《老獭稚传说之发生地》、《槃瓠神话的考察》及《中国民间传承中的鼠》等论文,发表在日本《民族学研究》等杂志上。同时也主编在国内出版的《民俗园地》。

抗日战争前一年,回国后仍住在杭州。我扩大了注意和研究的学艺范围。我着眼到一般民间艺术及民间科学、技术等民俗事象,留下了《被闲却的民间艺术》、《民众生活模式与民众教育》等文章。

抗日战争时期,前期因为主要在广东前方从事救亡工作,写了许多报告文学、抒情诗及带火药味的文艺短论,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论文,记得只写过《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后

期在粤北中山大学教书，也年年讲授民间文学课，但是，很少写作关于民间文学的论文。这有主观原因，更有客观原因：当时的社会环境，既不容许你冷静地作比较深入的学理钻研，更不容许你把理论研究联系到社会实践。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由于政治原因，被中山大学当局解除聘约（同时被解聘的，还有梅龚彬等教授）。逃到香港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办的达德学院教书。我所开的科目中，仍然有民间文学这一门（说一句笑话，它好象是我教学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当时所写的文章也不少，有散文，有论文，还有诗歌。在论文中，关于方言文学的就有好几篇，但是关于民间文学的却只有《民间讽刺诗》、《从民谣角度看〈王贵与李香香〉》（后改名为《谈〈王贵与李香香〉》）两篇。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到了北京，参加筹备并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几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在新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较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我个人这方面活动取得一些成果的时期。我们创建了专业性的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刊了以理论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出了三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影响停刊）。我不但继续开设民间文学课（当时称“人民口头创作”），而且招收了研究生，又写了许多长短不一的论文。这是我的一个创作丰产季节！

但是，青春难驻，接着来的是肃杀的季节。反右扩大化使我跟许多学界的同志一样，交了“华盖运”！在那些年月里，正常的教学工作都被停止了，还谈什么研究和写作科学论文呢？尽管情势如此，我还是不肯抛弃这门学术和提高它的水平的心愿。我争取时间，集中精力，开辟了对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

史的研究工程，现在收在这集子里的那几篇关于晚清革命派和改良派民间文艺观的论文，就是这个时期在艰难处境的夹缝中挣扎所得的一点成绩。虽然后来被阻抑没有全部完成，并且本身也还不免带有酸涩之处；但是，它将是未来一定要发达的我国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的一个开端，同时也是我始终忠诚于这门年轻科学的一片赤心的证据。

在上述研究工程正陷于停顿状态的时候，新的风暴“文化大革命”掀起来了！在那剧烈动乱的十年间，我个人的处境，我们这门学科及有关人和物的遭遇，我想用不着再来描述，大家是能够充分料想得到的。正如我几年前写赠秦牧同志的律诗里所说的：“十载冰霜花事尽”！这里所概括的情景，不论对于整个学艺界，或对于我个人，都是确切的。

人民的敌人，文化的刽子手，终于倒下了。我们学术的丰收季节又回来了。在最近几年里，我写了十多篇专业性的文章（大部分收进了这个集子里）。现在，我要郑重说一句，没有这个历史性的拨乱反正运动，我的十多篇论文固然无法出世，这个集子的刊行更是飘渺的梦想罢了！

在这篇序文里，照理应该谈一谈这个集子里所收文章的思想倾向，或者我这方面的思想历程。但是，文章内容那么复杂，写作过程又那么漫长，更重要的，还是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作过详细的清理、分析，仅凭一时粗略的回想，怎么能说得清楚、准确呢？可是，现在又不能让它完全脱略过去。不得已，只好把写作过程分作几个大段落，稍为指出其主要的思想倾向，算是这方面的一个速写或示意图吧。

二十年代前半，写作《歌谣杂谈》的时期，我只是受了当时

先辈们这方面活动的触发，因而产生热爱这种“野生”文艺的兴趣，并企图写出自己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对它的一点理解或感想。我的理解是粗浅的，思想力也相当薄弱。当然，那时我还没有专门从事这种学问，乃至为它献身的意念。

到了参加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工作时期，上述那种意念逐渐明确了。因此，对这方面的活动也注入了更多的力量（成绩的平庸，是由于另外的原因）。在学术观点上，这时初步知道应用人类学派的理论，民间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方法，也在我的观察和写作中略起作用。我已经逐渐摆脱初期所接受的、用纯粹文学理论去看待歌谣、故事等的态度，开始注意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的社会实践意义。

我的民间文学思想有较大的进展，是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这是个人学术进程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时期！由于大革命的一时挫败，许多参加过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集中到上海（当然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些思想战士），他们编译、出版宣传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书籍。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启蒙时期。它对于我国此后数十年间新的学术活动和革命实践运动起着巨大的作用。我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但是，那主要只对我的社会观起过一些作用，对于学术思想却触动不大。大革命失败后，情形就不同了。因为，当时马列主义不仅被作为社会革命理论传播，而且被应用到对中国历史和文艺的剖析和批判。这就使我的民间文学思想不能不受一定影响。但由于当时自己仍然生活在书斋中，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精神的主导力量，只是作为一种新因素存在于我的思考和写作里罢了。

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里还有另外一种新的思想因素。那就是法国涂尔干、居友等的社会学的宗教论、艺术论等的影响。这种思想因素，今天看来，当然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但是，它无疑有利于我摆脱那些不正确的文艺思想——例如认为文艺创作（包括人民的口头创作）只是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或者把它的作用只限制在非社会的狭小圈子里等。这种影响一直在我的民间文学及民俗学思想里延续到四十年代前期。

当然，除上述那些新因素之外，象英国人类学派的巨匠夫累则博士等的理论也混杂在我这方面的思想活动中。总之，当时我的民间文学思想，是相当驳杂的，还没有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东西存在。

在东京潜修时期，所接触乃至受影响的学术思想无疑是更加广阔的。例如在我的老师西村博士的神话、文化思想中，英国哈顿等人类学者的“文化传播论”，虽然不是唯一的，但也可说是占主导地位的。他的《天鹅处女故事研究》，正是一个好例子。这种学术思想和方法，多少在我的头脑中起过一些作用。其它，象松村武雄博士对神话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也给了我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这时期的民间文学思想，基本上仍是前期的继续，不过方面增广了，有些方面程度也加深了。如此而已。

抗日战争对于我的学术思想（包括民间文学思想），是一个颇为重大的冲击。它加强了我的社会实践的观念。在三十年代前期，我已经自觉地把对民间文艺和民间文化的搜集、研究，跟教育民众、提高民众文化等问题联结起来（自然，它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了抗战时期，因为动员和教育民众

的普遍和迫切的需要，一般文艺，包括民间文艺，为这种需要服务的问题就被提到我们眼前了。毛泽东同志的民族形式论，正是为解决这个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我在抗战期间所写的短论：《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也是谈了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社会实践的观念象一道桥梁，使我后来比较容易进一步接受马列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方法。

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比较自觉和认真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被迫投降，这年秋末，我从偏僻的连县回到广州石牌（中山大学所在地），有机会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对文艺的性质、作用及文艺家的任务等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接着是被迫客居香港。当时，国民党已下了所谓“讨伐令”，在蒋管区，不但中共的机构及人员不能留下，连一般民主人士也都成了逐客。他们不少人逃到香港这个岛上。单就文艺界的人士说，郭沫若、茅盾、柳亚子、夏衍、冯乃超……许多著名的作家、理论家都在那里。当时中国文艺家协会各分会中，除了解放区的以外，恐怕要算香港分会最革命的了。我们所讲学的达德学院，是这个岛上的“文化绿洲”。它的文学系尽管不能跟延安鲁艺的相比，但性质是接近的。在上述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的文艺思想，包括民间文艺思想被推进了一程，正是极自然的。当时这方面的文章，我虽然写得很少，但是，思想倾向比起三十年代那种驳杂不纯的情况来，显然有些不同了。

建国以后，我们的政治、文化政策，基本上是一边倒，即倒向当时由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民间文学工作也没有偏离这个轨道，至少在研究指导理论上是如此。当时我们的主要

倾向有两点：

(一)在这个学科的领域里，力争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特别是对经典作家有关言论的学习、援用。

(二)依照苏联学界的意见，把民间文学，只作为纯粹的文艺创作看待，即除了文艺学的角度外，一般不从其它人文科学的角度去进行考察、探索。

当时和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列宁的阶级社会里的两种文化论及高尔基等关于神话、民间故事、史诗等的言论，是我们这方面理论文章中最常引证的文献（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我自己当然也没有例外，本集上册所收录的（以及一些没有收录的）许多文章，都是很好的证明。

拨乱反正后，我们文化界产生了一个思想大解放运动。许多学术界的同志心眼擦得更明亮了。大家迈出了追求真理的新步伐。几年来，我也不断思考着这门学科的重要问题，得出一些多少有点新意的看法，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书面文学，因此，对于它的理论研究，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民间文艺学”。在今天，我们这种特殊的民间文艺学，虽然带有国际性，但是它的基础是民族的。没有后者，前者是空洞的。

(二)民间文学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首先，它具有内容丰富和门类繁复的科学系统。它有“总论性的”一般民间文艺学(例如我们现在学界流行的著述《民间文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入门书)，也有“分论性的”民间文艺学，如神话学、传说学、童话学(民间故事学)、歌谣学、谚语学等。其次，它包含着作品史和理论史(科学史)等的历史分科，前者如中国民间

文学史、神话史、传说史、歌谣史等，后者如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神话学史等。再次，还有收集、研究方法论、资料学等。在总论性或分类性的民间文艺学里，还可以分为“理论的民间文艺学”及“应用的民间文艺学”等。总之，民间文艺学是在人文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但它本身又是一个综合体，是许多支学科所结成的系统科学。从我国现在的学术情况说，不但对这种科学结构体系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且不管是总论性或分类性方面，不管是作品史、科学史或方法论方面，在研究和论述上，都存在着空白点。我们这门科学建设和推进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三）民间文学是一种民众（主要是物质生产者）所创作的文艺，对它的探索、研究，自然必须是文艺学的（严格地说，是“特殊文艺学”的）。但是，民众的文艺创作，跟他们所产生并生活其中的别的许多人文现象（如物质生产、原始科学技术、宗教活动、生活习惯、社会礼仪及各种艺术活动）是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它们具有一定的整体性。这种情况跟一般专业化作家的书面文学有根本或重大的差异。因此，对民间文学的研究，除了从文艺学（特殊文艺学）的观点或角度外，还必须运用其它人文科学的观点或角度，即采取民族学（或民族史）、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原始文化史以及民族心理学等的观点或角度去研究。自然，我们的研究，都必须统率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唯物论的辩证逻辑。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当然也不应排斥那些行之有效的其它科学方法。

这些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它的长久适用性。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事物又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某些观点怎能长久不变呢？

这个论集，分上下两册。上册所收的文章，是建国以后到最近写的关于民间文学的论文及一些杂文（短论、序文等）；下册所收的，是二十年代前期到解放前夜所写的有关文章，除一部分是论文外，更多的是随笔、札记、书评、序文等。

这些文章，有的对今天我国青壮年学者，可能有一定现实的参考作用，有的则只有科学史资料的意义。为了保存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因为自己一时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去修补，集子里所收的文章，除了对个别语词作些修订之外，一般不加变动。

我从年轻时候起，就热爱上这门新的人文科学。在时间的长流中，只要客观上条件许可，也不敢吝惜自己的脑力乃至物力（为了收集有关的文献和资料，我花去了相当的金钱）。但现在却仅能够以这样一些零散的文章与学界同志相见。实在很惭愧，也不免有些感触。我想起了一件旧事。三十年代初，我住在杭州，当时顾颉刚先生恰好也短期寄寓在那里。一天，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希望钟先生潜心努力十年，写成一部精审的著作！”这种殷切的期望和严厉的鞭策，直到现在回忆起来，好象还缭绕在耳旁。在那次谈话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确非常勤奋，想在将来写出一部有三、五十年生命力的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著作。我决心到海外去学习（这在经济上是相当困难的），不消说也跟这种愿望有密切关系。回国不久，便发生了抗日战争。我起初兴奋地参加了前线的抗敌工作，过了些时，这种正义的活动受到阻遏，只好回到那时迁移在山区里的大学教书。教学工作相当忙碌，研究资料也比较难得，加以反动派的不断压迫……在这种环境里，写作学术专著的

工作自然不能不搁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民间文学事业来说,是喜人的春天。象前面谈到的,这一段时期我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总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我去完成那写作专著的宿愿——尽管连题目也初步形成了,那就是《女娲考》(或作《从女娲神话看我国原始社会史》),有关的资料也收集了不少。

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以后的一段时期,我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被剥夺了。虽然象上面所说,曾在困难的环境中写了几篇关于近代科学史的论文,象《女娲考》之类专著的执笔,就缺乏条件了。至于十年动乱时期,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接受批判、体力劳动及写思想检查、历史材料等“大事”上,写作《女娲考》专著的事情,连做梦都很少想到了。前月出席北京市表彰先进大会,我心有感触,即景赋了两首绝句,那第二首前联说:

八十年华闪电过,平生志业半蹉跎。

所谓“蹉跎”的“志业”,正指的那学术专著一类的事。这看似平淡的诗句,是饱含着我的痛楚心情的。

“否极泰来”,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几年来,在我们民间文学事业的领域里,正在呈现一种蓬勃气势。理论研究上开始涌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但是,那成熟的日子是会很快到来的。我充分相信,我那流产了的民间文艺学专著,将会由他们去完成,而且将会完成得更加美好。刚才提到的那首即兴诗的下联是:

老怀不作消沉想，禹域春光此日多。

正是这个意思。从学界的气势看，现在不过是初春，千红万紫的秣春，还在未来。我们希望看到，也是一定能够看到的，是那“满园”的“春色”。至于“一枝红杏”的是否“出墙来”，又有多大关系呢？

最后，我要乘此机会，向许钰、张振犁、乌丙安、马昌仪、陈子艾、屈育德、梁木森诸同志表示谢意。因为他们有的替我校阅、修订全部或一部分文章，有的替我搜集、复印那些散在旧刊物里的文章，特别是子艾同志，在校订上为它耗去了不少精力。此外，我还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郑硕人、钱舜娟两同志。如果没有他们的建议、催促和帮助，至少，这个集子是不会这么快送到读者手里的。

钟 敬 文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写完